

匈牙利汉学家姑兰助推中华文化在匈传播路径研究

商梓腾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唐山

DOI:10.62836/ssr.v3n3.1201

摘要: 本文聚焦匈牙利汉学家姑兰 (Kalmár Éva), 考察其在中华文化于匈牙利传播中的作用。文章以《80-18=姑兰的中国记忆》、译作目录及相关研究为基础, 从翻译实践、编辑校对、学习方法和国际中文教育启示四方面展开分析。研究认为, 姑兰以古典文学、元曲和现当代小说译介为核心, 形成兼顾文本忠实、文化阐释与读者接受的翻译路径; 其编辑出版工作通过注释、导读与跨文化对话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可读性和学术性; 其中文学习经验则体现了多模态、情境化和文化融入的特点。本文旨在丰富中东欧汉学家个案研究, 并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国际中文教育提供参考。文章认为, 姑兰个案显示, 海外汉学传播并非单一译介行为, 而是由文本选择、翻译阐释、出版组织和教育转化共同构成的连续过程。

关键词: 姑兰; 汉学家; 中华文化; 路径研究

A Study on the Paths by Which the Hungarian Sinologist Kalmár Éva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Hungary

Ziteng S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ungarian sinologist Kalmár Éva and examines her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Hungary. Based on the interview “80-18 = Kalmár Éva’s Chinese Memories,” catalogues of translated works, and related studies, the paper analyzes her practice from four aspects: literary translation,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learning-method innov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Yuan drama,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Kalmár Éva developed a translation path that balances textual fidelit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reader reception. Her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work improved the readability and academic val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annotation, introductory guidance,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Her Chinese-learning experience also reflects multimodal, contextualized, and culturally integrated features. This paper aims to enrich case stud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inologis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case of Kalmár Éva shows that overseas Sinological communication is not a single act of translation, but a continuous process composed of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al

interpretation,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Kalmár Éva; sinologist; Chinese culture; path study

1 引言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汉学家既是语言转换者，也是文化解释者。匈牙利自19世纪以来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汉学传统，二战后又在高校教学、文学翻译和出版传播中持续发展。姑兰作为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经历了从中文学习、文学翻译到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的完整过程，其学术活动贯穿中匈文化交流的多个时期。相较于西欧汉学研究，学界对中东欧汉学家的个案梳理仍显不足。姑兰的价值在于，她的实践覆盖语言习得、文本译介、出版策划与教育启示等环节，能够较集中地呈现汉学家参与中华文化传播的复合角色。本文在既有资料基础上，围绕翻译成果、编辑校对、学习方法创新及其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展开论述，以期揭示姑兰助推中华文化在匈牙利传播的主要路径。同时，姑兰身处匈牙利这一非英语文化语境，其翻译和教学活动能够反映小语种国家接受中国文化的特殊机制：既依赖个人学术积累，也依赖出版社、高校和读者社群形成的长期支持[1-4]。

2 姑兰的翻译成果

2.1 姑兰翻译作品概况

姑兰的翻译生涯横跨古典文学、元曲、现当代小说与文化典籍等领域，作品数量丰富，在匈牙利汉学界具有较高辨识度。

在古典文学领域，她译介《西游记》《道德经》《孽海花》《老残游记》等作品，使匈牙利读者得以从神魔叙事、道家思想和晚清小说中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面向[5-7]。

在元曲翻译方面，她根据早期匈牙利文献线索追溯《元曲选》原文，翻译《看钱奴》等剧

作，并于1978年推出《元杂剧三篇》，同时撰写中国戏曲发展介绍，为匈牙利读者理解元杂剧提供了重要入口[8]。

在现代与当代文学方面，她译介鲁迅、周作人、老舍、林语堂以及莫言、苏童、孙犁、三毛、陈村等作家作品，使匈牙利读者能够接触中国文学从启蒙、社会批判到乡土书写和个体经验表达的变化。千禧年后，她主编并参与翻译《20世纪中国小说选》，以选本方式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脉络；近年又参与山东汉画像石、孤本年画和京剧故事等项目，进一步拓展了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边界。她在选材上兼顾经典性与时代性，既重视鲁迅、老舍等作家的思想史价值，也关注莫言、苏童等当代作家对乡土、记忆和人性的书写，使匈牙利读者能够看到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层次[9-11]。

2.2 翻译范式与方法论革新

姑兰在元曲译介中提出兼顾文本形态、典故考释和戏剧元素的翻译思路。面对元曲韵文结构，她尝试以匈牙利语诗体和节奏资源加以转换，使译文在可读性之外保留一定舞台唱词感。这种处理避免了将元曲简单散文化的倾向，也使译文在目标语中保留可朗读、可感知的节奏效果[1,12]。

在典故处理上，她重视注释与比较阐释，通过追溯中国典籍出处，并引入匈牙利读者较熟悉的文化意象，降低异质文化理解难度。此类注释并非单纯解释词义，而是建立原作语境与目标读者经验之间的桥梁。这种做法尤其适合中东欧读者，因为他们并非总能通过既有东方学知识理解中国典故，需要译者提供更具解释性的阅读路径[9,12]。

在戏剧元素处理上，她将“生旦净末丑”等中国戏曲行当转化为匈牙利读者可理解的舞台角色概念，既保留角色功能，又避免因术语陌生造成

阅读中断。

在现代文学编译中，姑兰不满足于按年代排列作品，而是以“疾病叙事”“革命寓言”“乡土中国”等主题组织文本，将鲁迅、莫言等不同时期作家的作品置于同一问题域中考察。此种主题化方式突出中国文学在社会批判、历史记忆与人性书写上的连续性，也为匈牙利学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较清晰的文化坐标。她的主题化编排还具有教学价值：读者可以围绕同一主题比较不同时期文本的叙事策略，从而理解文学如何回应社会转型、历史创伤和个体命运。由此，译本不仅是作品集合，也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阅读框架。

2.3 语言风格层面的创举

在语言风格层面，姑兰强调“文化适应式翻译”。面对中文流水句和意合结构，她常采用匈牙利语复合句、连接词和后置修饰语，使译文符合目标语习惯，同时保留原文叙事的舒缓节奏。这体现出她对“忠实”的理解并不限于字面对应，而是强调在目标语中重建原作的审美节奏和叙事功能[3,7]。

在方言处理上，她倾向于采用“标准语转写加注释”的办法。例如处理具有地域色彩的自称或口语词时，先译出基本意义，再通过括注提示其方言属性，从而兼顾理解效率与地域风格。

2.4 翻译成就的深远学术影响

姑兰的翻译实践推动了匈牙利学界对中国戏曲和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关注。其元曲译本使研究者不再只把戏曲视为文本材料，而开始重视唱词、角色和舞台性等因素。这种转向使中国戏曲译介从“文学文本”扩展到“综合艺术”，拓宽了匈牙利学界讨论中国戏曲的维度[13,14]。

《20世纪中国小说选》则通过主题编排强化了文学传统的动态性，提示读者从文化流动、时代转换和文本互文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学，而非将作品孤立地置于单一历史节点[9,10]。

从接受效果看，姑兰译作在匈牙利形成了稳定读者群。《活着》等作品的传播，使当地读者得以

从普通人的生命经验进入中国近现代历史，也说明文学翻译能够在情感共鸣与社会理解之间搭建有效桥梁。这也说明，优秀译者能够通过精准选本和稳定译文，把陌生文化转化为目标读者愿意持续阅读和讨论的文学对象。

3 姑兰的编辑校对工作

3.1 编辑校对工作概况

姑兰的编辑校对工作涉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学术著作与文化典籍，体现出从文本校勘到出版传播的系统意识[15]。

在古典文学编辑中，她不仅关注译文准确性，也重视异文校勘、背景说明和附录材料建设。如《元曲选》相关译本通过角色考释和戏曲制度说明，补充了匈牙利读者理解中国戏曲所需的知识框架。这种编辑方式降低了读者进入古典文本的门槛，也使译本具备高校教学和研究引用的条件[8,14]。

现代文学编辑方面，她在莫言等作家作品的校对中关注方言、叙事节奏和文化语境，通过译者协作与多轮校订提高译本稳定性，使地域文学特色在目标语中得到相对充分的呈现。

在学术著作和文化典籍方面，她注重概念统一与副文本建设，通过术语注释、范畴对照和图像说明等方式，提升译本的学术参考价值。

3.2 出版策略创新

姑兰在“中国文学丛书”等出版实践中形成“双轨制”思路：古典文学偏重学术型译本，通过导读、注释和制度说明增强解释力度；现代文学则强调作家、译者和编辑之间的合作，力求在忠实原作与适应目标语文化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根据文本类型选择不同副文本策略：古典作品需要历史制度、礼俗和典故说明；现当代作品则更需要时代背景、作家访谈和关键词注释，以帮助读者把握文本所处社会环境[9,10]。

以现代小说译介为例，她通过终校讨论、背景说明和必要注释处理政策、方言和地域文化等问题，使译本既保持文学质感，又便于匈牙利读者进入文本语境。

在文化生态构建方面，姑兰推动“中国文学工作坊”等活动，通过译者、作家、评论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延伸译本的传播生命。她倡导的分级阅读思路，将经典、现代与当代文学区分呈现，既照顾初学者阅读门槛，也为高校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材料。这种由出版延伸至活动、课程和读者社群的方式，使中国文学传播不止停留在书籍销售层面，而是转化为持续的文化交流机制。

3.3 数字化传播布局

姑兰较早关注数字化传播。她主导或参与的“中国文学数据库”收录译稿、手稿和戏曲影像资料，并设置匈牙利语检索功能，使学习者能够从文本、图像和表演材料中综合认识中国文学与艺术。对于缺乏中文环境的匈牙利学习者而言，数据库把原文、译文和表演材料集中呈现，弥补了纸质教材信息单一、更新较慢的不足[15]。

网络化升级后，数据库进一步加入译本对比、在线翻译练习和数字地图等内容，将文学文本与地理、图像和互动学习结合起来，扩大了中国文学在青年学习者中的可及性。这些尝试使传统文学译介与数字人文方法结合起来，增强了学习者的参与感，也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形式。

总体看，姑兰的编辑校对并非单纯文字修订，而是通过注释、导读、跨文化对话和数字资源建设，构建立体化传播体系，使中国文学在匈牙利由“异域读物”逐步转化为可阅读、可研究、可教学的文化资源。

4 姑兰的学习方法创新

姑兰的中文学习经历兼具个人经验与教育启示。她在不同阶段采用非正式学习、多模态记忆和文化浸润等方法，形成了较完整的语言能力发展路径[16]。

4.1 启蒙阶段的非正式学习：游戏教学法

姑兰的中文学习始于1952年前后。启蒙阶段，她与朋友将常用汉字制成卡片，通过配对和重复游戏识记字形。这种方式把抽象文字转化为可操作

的学习对象，既降低了初学难度，也符合间隔重复和分散记忆的基本规律。该阶段虽然缺少系统课堂训练，却通过游戏化方式保持了学习动机，说明初级阶段的兴趣维护对长期学习具有基础性意义[16,17]。

4.2 留学期间的多模态学习：三维记忆法

留学北京大学期间，她采用视觉、听觉和动觉结合的“三维记忆法”：通过词汇便签强化视觉输入，借助录音矫正声调，以反复书写形成肌肉记忆。多通道输入与输出共同作用，使她较快完成从识字到交际表达的过渡。这一方法也体现了语言学习的整合性：声调、字形和书写并非孤立训练，而是在反复关联中形成整体记忆[16,17]。

4.3 文化学习策略：语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在文化学习方面，姑兰重视把语言置于真实文化情境中理解。她参加京剧票友活动，观察程式化表演与身体表达；又在日常交际中积累口语变体，由此认识到语言形式背后的礼俗、情感与社会关系。因而，她后来的翻译能够敏锐处理称谓、节奏、语气和文化象征等细节，与早期文化体验密切相关[18,19]。

由此可见，姑兰的学习方法并非单纯追求词汇和语法积累，而是将兴趣激发、记忆策略和文化体验结合起来。这为国际中文学习者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语言学习应在多模态输入、真实交际和文化理解中协同推进。

5 姑兰的中文传播实践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

5.1 教材编写的创新与文化情境融入

姑兰在教材编写上强调文化情境融入。《汉语入门》等教材突破单一语法大纲，将量词、称谓、礼貌表达等知识置于茶馆、家庭、课堂等交际场景中，使学习者在功能使用中理解语言规则。这种设计体现了从“讲语言”到“用语言做事”的转向，能够减少机械操练，提高学习者在真实交际中的迁移能力[20-22]。

这一经验提示，国际中文教材应强化“形式—功能—文化”结合，设计贴近学习者生活又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任务场景，使语言技能训练与文化理解同步完成[23]。

5.2 文化传播策略的智慧与跨文化沟通

姑兰的文化传播策略可概括为在忠实与可读之间寻求平衡。面对文化差异，她通过删繁就简、寻找对应意象和保留特色加注释等办法，使中国文化元素既不被过度归化，也不因解释不足而变得晦涩。对国际中文教育而言，这意味着文化教学既不能一味淡化差异，也不能把差异处理成难以理解的知识壁垒，而应通过解释和比较实现有效传达。

国际中文教育同样需要这种跨文化沟通意识。教师应充分了解学习者背景，灵活使用讲座、影像、阅读讨论和体验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在比较中理解中国文化，而不是停留在知识罗列层面[23]。

5.3 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与全球视野拓展

姑兰的经历表明，跨文化能力不仅是语言转换能力，更包括对文化差异的识别、解释和协调能力。她在翻译中关注概念、意象和情感结构的传递，为跨文化教育提供了实践范例[11,20]。

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应通过跨文化交际课程、项目合作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与文化协商能力，引导其尊重差异、理解语境并形成开放的文化态度。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翻译、教学、商务和公共传播等场景中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经验。

5.4 教学实践与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

姑兰的“沉浸式学习法”和“三维记忆法”说明，有效教学需要创造持续输入、充分输出和及时反馈的环境。学习者只有在多种情境中使用语言，才能形成稳定能力[18,19,24]。

具体到教学实践，教师可结合多媒体资源、任务型教学和合作学习，增加阅读、听说、写作与文化体验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过程性评价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评价方式也

应从单一考试转向课堂表现、项目成果和反思报告相结合，以便更全面地观察学生的语言运用与文化理解。

5.5 汉学家培养路径的启示与国际化人才培养

姑兰的学术道路显示，汉学家培养需要扎实语言基础、深厚文化素养和持续实践经验。语言能力是进入中国文化的前提，翻译、研究和出版实践则是能力深化的重要途径[19,23]。

国际中文教育可借鉴这一路径，在课程设置中加强语言、文学、历史、传播和翻译等跨学科融合，在评价中兼顾知识掌握、实践能力和跨文化表达，从而培养能够参与中外交流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应鼓励学习者参与翻译实践、文化活动策划和海外传播项目，在真实任务中提升综合能力。

综上，姑兰的中文传播实践对教材建设、文化传播、能力培养和人才培养均有启示。其经验说明，国际中文教育应从单向知识传授转向以交流、理解和实践为核心的综合培养。

6 结论

姑兰六十余年的汉学实践，构成了从语言学习到学术传播、从文学翻译到文化体系建设的完整路径。其翻译实践以文化适应和学术阐释突破语言壁垒，使中国文学在匈牙利获得更深入的接受；其编辑出版工作通过注释、导读、合作校订和数字资源建设，培育了较稳定的中文读者群与研究基础；其学习方法则从兴趣激发、多模态记忆和文化浸润等方面，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经验参照。本文的意义在于以姑兰为个案，补充中东欧汉学家研究材料，并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提供可借鉴的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整理其翻译档案，开展中匈读者接受效果比较，并将相关经验扩展至其他非通用语种地区。姑兰的实践表明，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理解与对话，而汉学家正是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桥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姑兰个案还提示我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要长期主义：只有持续培养本土译者、建设稳定出版渠道并形成双向互动机制，文化交流才能从短期展示

走向深度理解[13,14,25]。

参考文献:

- [1] 陈吉荣.汉学家梅维恒中国文学翻译的范畴化探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6(01):29-36.
- [2] 刘明.拉美汉学家:文明国家间的沟通尤为重要[N].环球时报,2024-11-05(013).
- [3] 姜国会.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庄子》英译本的传播与接受:现状、原因与启示[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24,33(06):61-69.
- [4] 兴万生,李孝风.匈牙利汉学家、翻译家——杜克义院士[J].世界文学,1994,(04):272-276.
- [5] 陶晨萍.基于语料库的中华典籍汉学家英译本比较研究——以《西游记》为例[J].文化学刊,2025,(03):182-185.
- [6] 路斯琪.概念阐释与知识会通:19世纪法国汉学家对老学知识的考古与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25,(02):220-226.
- [7] 陈月红,朱振武.汉学家中国文学外译的得与失——以《西游记》詹纳尔英译本的考察为中心[J].天津社会科学,2025,(01):36-43.
- [8] 余泽民.80-18=姑兰的中国记忆[J].汉风,2018,(01):140-144.
- [9] 李佳,刘婧妹.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合作机制、问题及建议[J].中国出版,2024,(13):13-17.
- [10] 於伟澄.从汉学家为主体到出版社为核心——兼论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区的传播范式[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01):52-59.
- [11] 单伟龙.美国汉学家英译当代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31(04):101-105.
- [12] 刘翔,胡巧巧.翻译副文本的民俗形象建构研究——以汉学家伊维德说唱文学英译本为例[J].语言教育,2024,12(04):1-11.
- [13] 罗志春,李昂.匈牙利汉学发展述略[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8):62-66.
- [14] 王治江,王雪彤,王靖怡.中国文学典籍在匈牙利的译介概略[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6):115-120.
- [15] 尹琨.海外汉学家、出版人“支招”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4-06-25(001).
- [16] 薛琳,白乐桑.被“低估”的国际中文教育史研究——访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J].国际汉学,2024,(04):117-122+148.
- [17] 罗恬颖,钱丹,白乐桑.从汉字的诗性到“字本位”教学法——法国汉学家白乐桑教授访谈录[J].国际汉学,2025,(02):130-137.
- [18] 刘燕,包华石.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理路与创新——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访谈录[J].国际汉学,2025,(01):131-138.
- [19] 汪晓宇.19世纪英国汉学家萨默斯的中文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D].大连外国语大学,2024.
- [20] 黎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匈牙利的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J].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20,5(02):100-110.
- [21] 张鹏.匈牙利中文教育本土化:特征、动因及优化策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02):97-108.
- [22] 叶秋月.匈牙利汉语教学的历史与现状——以罗兰大学中文系和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为例[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21,(01):177-185.
- [23] 吴应辉.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八大功能与实现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3):48-56.
- [24] 沈莉娜,李萌萌,于月辉.信息化时代下匈牙利本土国际中文教师培训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2):123-128.
- [25] 叶枝梅.匈牙利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尤山度[J].国际汉学,2024,(06):68.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